

# 《圣经》中文译本考

任东升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圣经》汉译史上产生过文理(文言)、浅文理(浅文言)、官话(白话)、现代汉语四种语体的全译本和节译本,且译者文化身份多样。考察重要《圣经》译本的史实和特征有助于揭示圣经汉译活动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影响。

**关键词:**圣经中文译本;特征;历史意义;文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22X (2006) 01-0055-05

## A Survey of Chinese Bible Versions

REN Dong-sheng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dong Prov., 266071,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has seen complete and incomplete versions in four styles, namely *Wenli* (classical literary Chinese), *Easy Wenli* (easy classical literary Chinese), *Guanhua* (Mandari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Involved translators were of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 critical survey of the publication fac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ome influential versions reveals the historical impact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ng as a cultural event.

**Key words:** Chinese Bible versions; characteristic; historical impact; cultural significance

### 0. 引言

在中国,《圣经》的翻译始于唐朝(635年),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产生过文理(文言)、浅文理(浅文言)、官话(白话)、现代汉语四种语体的全译本、多卷本、单卷本和节译本,还有土白话(方言)、少数民族语言译本以及汉—英、汉语—罗马注音对照本。《中国翻译词典》(1997: 1134-1146)“中国翻译大事记”中列举了从唐代至1919年间的《圣经》翻译九大事件和主要版本,但是并没有收录1919年之后《圣经》汉译的重要事件和版本,尤其是中国学者翻译的《圣经》单卷或片断翻译。本文拟对几种《圣经》中文译本做深入考察,旨在揭示《圣经》汉译活动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影响。

#### 1. 唐代“景教本”的性质

景教在唐代传入中国时已有《圣经》(当时称“真经”)译述,其蓝本是古叙利亚语《圣经》(文庸,1992: 31),翻译出来的《圣经》书卷有三十部(赵维本,1993: 9-10;邹振环,1996: 38;李宽淑,1998: 16-17)。这些“译本”被称为“景教本”(卓

新平,2000: 28),但早已失传。景教士初来中土,根本不懂汉语。他们“翻译”或“撰述”以《圣经》为主要内容的景教经典时,也像佛经传入中国之初一样,只能是西人口述,华人抄录、逐写。如佛教《四十二章经》,梁启超和胡适皆断言并非翻译之作,而是撰述。《序听迷诗所经》虽然是最早的一篇汉译景教文典,但是朱谦之认为是“补缀新旧两约圣书之文”(1993: 118),也就是说阿罗本从《圣经》旧约、新约甚至使徒教义等文献中东节西录撰写成文,然后口述比划,请中土人士译出(翁绍军,1996: 36),所以它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译作”,而是“撰著”。

#### 2. 两个重要的“明清本”

“明清本”指代出现于明清之际由耶稣会士翻译的中文《圣经》译本。Eva Hung(孔慧怡)和David Pollard撰写的*Chinese Tradition*中专门提到两个“明清本”。(Mona Baker, 1998: 369) 17世纪末,法国传教士巴设(Jean Bassett, 1662-1707)把拉丁文《圣经》片断《福音全书》、《使徒行传》、《保罗书信》、《希伯来书》第一章等译成白话文。

收稿日期: 2005-03-18

作者简介: 任东升(1966-),男,河北井陘人,中国海洋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和《圣经》翻译研究。

1739年,他的译稿在广州被发现。因为当时这份译稿是经由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史罗安爵士转送给伦敦大英博物馆,因此被称为“史罗安手本”(Sloan Manuscript)或“英国博物馆稿本”(赵维本,1993:13),现存于大英博物馆。1807年第一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时,就是托一位中国人从大英博物馆抄写了巴设的译稿,并从中学习中文。这个《圣经》汉译本的手稿不仅在国外很有影响,而且因为它是基督教新教译者(马礼逊、马士曼)与天主教译者(巴设)在《圣经》汉译传统上“接力”的见证,因而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马礼逊的“巴设译本”手抄稿现存于香港大学马礼逊纪念馆。

18世纪后半叶,精通汉语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贺清泰(P. L. Depoirot, 1753-1814)根据哲罗姆的《通俗拉丁文译本》(Vulgate, 382-405),用官话翻译了除大部分先知书和《雅歌》之外的《旧约》和《新约》内容,取名《古新圣经》,计34卷,章节与拉丁文《圣经》不大相同。《古新圣经》是这一时期篇幅最长的中文白话文《圣经》(其详细书目参见徐宗泽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19-20页)。当1803年梵蒂冈教廷闻知这部译本时,虽然称赞贺清泰的热心,却禁止出版他的译作。(尤思德,2002:16)《古新圣经》虽然没有得到正式出版,但在1862年,白话《古新圣经问答》一书被刻印出版,《古新圣经》的名望随之传播开来。值得注意的是,直接以中文“圣经”二字命名《圣经》这本书,《古新圣经》是首次。另外,该译本包含了《圣经》汉译史上第一份《圣经·之序》和《圣经·再序》。其中扼要总结了西方《圣经》翻译的“忠实”情结,说明了自己的“加译”策略。这是针对《圣经》汉译实践所做的首次理论尝试,因而被中国学者陈富康纳入“中国翻译理论”。(1992:60-61)这份译稿的抄本保存在徐家汇藏书楼。

### 3. 四部影响重大的《圣经》

从1819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翻译完整部《圣经》至1919年《新旧约全书》官话“和合本”问世这100年间,共出现了9部完整的文理(即文言)、浅文理(即浅文言)、官话(即白话)《圣经》译本。“文理”(Wenli)一词由19世纪来华传教士杜撰,用来专指古典中文,随后又出现了“深文理”(High Wenli,即文言)和“浅文理”(Easy Wenli,即浅文言)的区分。“官话”(Mandarin),旧指官方普遍使用的共同语言,历史上还有“雅言”“通语”“凡语”之称。

除了官方使用、通行范围比方言广泛以外,还含有文雅的意思在内。清末的“官话”是指明清以来以北京方言为基础形成的官方普遍使用的共同语。下面我们重点介绍几种全译本。

#### 3.1 “郭实腊译本”与太平天国

《圣经》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最直接、最深刻的影响,莫过于它对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所起的关键作用。据说,“天国”就来自郭实腊所译福音书中的“天国”(the kingdom of God)。郭实腊(K. F. A. Gutzlaff, 1803-1851;又译“郭士立”)是位普鲁士传教士,参加了“四人小组译本”的翻译工作。《新约》由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担任主译,取名《新遗诏书》;《旧约》差不多出自郭实腊一人之手,取名《旧遗诏书》。郭实腊后来对小组译本的《新约》进行反复修订,做过不少实质上的改动,取名《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陈惠荣,1986:16;顾长声,2005:52)后来郭实腊将自己翻译、后又修订的《旧约》部分,与《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合而为一,于1855年出版,即所谓的“郭实腊译本”。

郭实腊译本,尤其是《新约》部分,即《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曾流传于太平天国军队中,太平天国政权的文告中引用的《圣经》经文大多摘自其中。(梁工,1996:706)太平天国政权定都南京后,洪秀全熟读《圣经》(顾长声,1981:86),并于1853年“钦定”出版了好几部以郭实腊译本为依据、经过删节的《圣经》版本(海恩波,2000:223)。根据郭实腊的说法,太平军将“新约”和“旧约”统称为“遗诏”,后面再加“圣书”二字。太平天国使用的《圣经》,除了一部取自《新约》的《钦定前遗诏圣书》外,其他均为经过删节的版本,且名称多样。如取自《创世记》和《出埃及记》的《旧遗诏圣书》;取自《创世记》和《士师记》的《钦定旧遗诏圣书》;取自《创世记》和《士师记》的《钦定旧遗诏圣书》;只取自《马太福音》的《新遗诏圣书》;取自《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钦定新遗诏圣书》。据说洪秀全手下有500人从事《圣经》的汉译和改编工作。《创世记》、《出埃及记》、《民数记》、《马太福音》等甚至作为考生会试(状元考试)的指定书目(海恩波,2000:91;赵维本,1993:19-20),考试的题目就取自其中,从而废除了清王朝仍在使用的古代经书(福斯特,1985:171)。太平天国《圣经》的封面也具有“中国特色”,如《旧遗诏圣书》的封面(注意,是“遗诏圣书”而不是“遗诏圣书”),醒目的汉字“旧遗诏圣书”两边是一对儿飞舞的双龙,上方为一对儿

凤凰，顶部有“太平天国三年癸好初刻”字样。这些版本成了基督教《圣经》影响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的见证。

### 3.2 流传到欧洲的第一部中文《圣经》：《神天圣书》

肩负着把《圣经》翻译成汉语使命来华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于1823年把自己和助手用文言文翻译的整部《圣经》装订成21卷线装书，在马六甲正式出版，取名《神天圣书》，并运回中国秘密传播。《神天圣书》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部完整的《圣经》汉译本，成为“文理译本的主流”（毛发生，2004）。马礼逊追求译文的“忠实（fidelity）、明达（perspicuity）、简易（simplicity）”，甚至表达上的“地道（idiomatically）”。（Strandeneas, 1987: 44）马礼逊所创立的中文《圣经》术语为以后的《圣经》翻译奠定了基础。1824年马礼逊分别向英王乔治四世和大英圣书公会呈献了一部《神天圣书》（马礼逊夫人，2004：226-227；231），该译本遂引起轰动，欧洲各大图书馆也以拥有这部中文《圣经》为荣（谭树林，2000）。

### 3.3 流入清末皇宫的《圣经》：“君王版”

曾经有5本配有龙饰的昂贵《新约》进入清末统治最高层，这个《圣经》版本就是史称的“君王版”。1874-1853年间，包括理雅各在内的英美传教士代表用文言文翻译了所谓的“代表译本”（又名“委办译本”“会使译本”）。《新约全书》于1852年面世，美国圣经会出版“神”版，大英圣书公会出版“上帝”版。《旧约全书》于1854年出版（一说1853年），1867年“代表译本”新旧约合并出版。由于著名汉学家、翻译家理雅各的参与和中国“第一流学者”王韬的最后襄理，这个版本文笔优雅，文采斐然，遂成为“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中文《圣经》”。（尤思德，2002：363）1894年适逢慈禧太后60岁祝寿，上海部分传教士发动全国女教徒捐款，特别印制了2号宋体活字直排出版的精美特大《新约全书》，印上黄龙图案，嵌入银盒之中，请英国和美国的外交使节呈进宫中，献给慈禧。这个《圣经》译本使用2号大字，为的是方便慈禧这位年老眼花的“君王”阅读，于是得名“君王版”。1910年宣统皇帝登基后，传教士又发动全国教徒捐款，重版1894年的《新约全书》4本，分别呈送隆裕太后、宣统皇帝、摄政王和醇王福晋。（邹振环，1996：39）可见，所谓的“君王版”《圣经》只有新约部分，而不是全部。“君王版”《圣经》给我们留下了基督教通过其核心载体《圣经》

“征服”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历史见证。

### 3.4 新文化译本：官话和合本

官话和合本的翻译工作历时27年，以1885年出版的《英文修订本圣经》（*Revised Version of the English Bible*）为蓝本（赵维本，1993：33），得到中国学者诚静怡、刘大成、王治心、王元德（王宣尘）等的协助，于1919年4月22日在上海面世，取名《新旧约全书》，分“神”和“上帝”两个版本，约110万字。该译本的版面如蝶翅，故又名“蝴蝶本”。官话和合本启用了1000条新的汉语表达方法，并创造了87个新汉字。（I-Jin Loh, 1995）对白话文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形式借鉴和语言资源。后世誉之为“适合对外开放的新文化译本”（周作人，1921）、“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朱维之，1992：70）、“中文圣经翻译史的巅峰”（《圣经新译本》2001年版序）。1939年官话和合本更名为“国语和合本”。1962年，在编辑上做了某些改动后正式改为《圣经》。1988年，香港“联合圣经公会”推出了经过简单修订的《新标点和合本》。大陆学者备在案头的《圣经》就是该译本的繁体、简体或中英对照版。

朱维之认为官话和合本“恰好在我国新文学运动底前夕完成”（1992：70）。具体时间，有学者说是“1月23日”（陈忠，2004），香港学者赵维本（1993：43）的《译经溯源》和大陆学者马祖毅的《中国翻译史》（1999：246）都采用“1919年2月”。德国学者尤思德对来华差会的档案进行细致研究后发现，由于官话和合本《新约》的修订工作完成于1918年12月底，1918年12月31日最后定稿才送进印刷厂，结果合而为一的《新旧约全书》直到1919年4月22日才从印刷厂运出。鉴于此，官话和合本的确切出版日期应以“1919年4月22日”为准。（2002：239）

### 4. “后和合本”

尤思德用“后和合本”（Post-Union Version）指1919年之后中国翻译家翻译出版的《圣经》。20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有教内华人翻译的几部《新约》版本。引人注目的是1946年燕京大学希腊文教师吕振中翻译的《吕译新约初稿》，该译本的目标是“信、达、雅兼筹并顾”。1970年吕振中翻译的《旧新约圣经》在香港出版，是第一部由华人独自完成的《圣经》译本。

《圣经》全译本“思高本”是当代中国天主教使用的惟一权威译本，由雷永明（G. M. Allegra）领导的“思高圣经学会”（*Studium Biblicum Francis-*

canum) 在 1961 - 1968 年间根据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圣经》翻译而成, 1968 年在香港出版。该译本与“和合本”在篇章数目及名称、人名地名、主要神学术语都有很大不同。

1979 年, 新教学者许牧世、周联华、骆维仁等联合翻译的《现代中文译本》在香港出版, 1995 年推出修订版, 中国大陆的教会组织曾在南京印行少量, 也流传到普通学者中间。该译本以《现代英文译本》(Today's English Version, 1976) 为蓝本, 以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译本为修正根据, 以奈达的“动态/功能对等”为指导原则, 面向的读者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非基督徒, 神学术语少, 流畅易懂。该译本曾出版过天主教版本, 将“上帝”改为“天主”, “圣灵”改为“圣神”, 其他译文不变。

1992 年香港初版的《圣经新译本》是“第一本由华人圣经学者集体直接由原文翻译的《圣经》”。(译本序言, 1999) 译者是以容保罗为总干事的 30 多位华人翻译家。此译本根据联合圣经公会的《希腊文新约》第三版 (Greek New Testament, 1966) 为蓝本, 参考“和合本”, 以“形式相符 (formal correspondence)” (尤思德, 2002: 415), 自称是“兼具信、达、雅果效的佳作”为原则, 纠正了“和合本”中不少错译、漏译、多译的地方, 并于 1999 年推出第二版, 2001 年推出“跨世纪版”。

### 5. 中国翻译家的《圣经》(片断) 译本

近代“译界泰斗”严复是第一个独立翻译《圣经》片断的中国翻译家。严复在基督教和《圣经》方面有着相当的学养 (任东升, 2004), 他在 1908 年应大英圣书公会聘请, 用他一贯提倡的“汉以前句法字法”翻译了《马可福音》的前 4 章, 计约 3400 字, 由大英公会委托商务印书馆在上海代印出版。委托人文显理赞誉其“可与任何级别的中文最佳典籍相媲美” (李焯昌、李天纲, 2000)。严复的文言译文之“雅”与马礼逊及其后来者的文言《圣经》之“文理”代表两个不同的趋向。前者以严复一贯提倡的“汉以前句法字法”为追求, 以“古”“奥”“僻”为鲜明特征, 是一个“精英化”译本; 后者的读者目标逐渐由文人转向一般大众, 遂呈现出“俚俗化”倾向。此外, 严复通过采用删改、置换、引衬、增益等多种文学翻译手段, 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才能。他的译文措辞精练, 句式严整, 庄重典雅, 堪称一流的翻译文学作品。以严复翻译《马可福音》片断为标志, 《圣经》汉译呈现出文学化趋向。(任东升, 2003)

中国翻译家对《圣经》诗歌的文学品质具有敏

锐的鉴赏力, 许地山 (1921)、吴曙天 (1931) 陈梦家 (1932) 都翻译过《雅歌》, 李荣芳 (1931)、朱维之 (1941) 用骚体翻译了《耶利米哀歌》或片断, 吴经熊 (1946) 用五言、七言、骚体翻译过《诗篇》。李荣芳在译文里首次使用“亚卫”神名 22 次, 取代“耶和華”。这标志着《圣经》汉译呈现多元化局面, “亚卫”神名被朱维之、梁工等沿用至今。此外, 中国翻译家受中国传统诗学影响而开创的“以诗译诗”新传统, 有别于世界范围内《圣经》诗歌翻译“散文化”的传统。笔者 (2005) 已经做过专论, 兹不赘述。

### 6. 张久宣的《圣经后典》

“后典”相对于基督教三大派别共同承认的“旧约”和“新约”66 卷“首正经” (Protocanonical Books, 即“正典”) 而言, 共计 15 篇。教外读者有一种印象: 天主教使用的《圣经》译本必有“后典”内容, 而新教使用的《圣经》译本没有“后典”。从学术的观点出发, 除了《旧约》、《新约》, 《圣经》应该包括“后典”部分。朱维之早在上世纪 40 年代就持此观点。实际上, 1611 年问世的英文“钦定本”就包含“后典”。(Metzger and Coogan, 2002: 508 - 509) 20 世纪出版的主要英文译本如《新英语圣经》、《现代英文译本》均包含后典。然而在中国 (包括香港), “官话和合本”、《现代中文译本》及《圣经新译本》出于新教的传统, 没有把“后典”内容包括进去。1987 年, 大陆译者张久宣根据《现代英文译本》“天主教版”中的《后典》(Apocrypha) 翻译出《圣经后典》15 篇 (配有插图, 1996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这是中国翻译家首次将《圣经后典》翻译成现代汉语。该译本注意与原文风格的一致, 用词准确, 富有与原文相当的文学性和可读性, 诗歌部分的翻译尤其富有文采。

### 7. 结语

《圣经》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 100 种译作之一 (邹振环, 1996: 36 - 41)。《圣经》汉译活动曾多次给中西文化交流带来契机, 从而促进了中国和西方世界在文化典籍、宗教传统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交流。可以说, 《圣经》中文译本的制作和流传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圣经》翻译活动由于不信任何教经的中国翻译家的参与而呈现出文学化和多元化的趋向。文学化趋向以严复用优美的古文翻译《圣经》片断为标志; 多元化趋向以李荣芳启用“亚卫”神名为标志。教会单方面诠释《圣经》的垄断权因此被打破, 《圣经》在当代中国文学认

知语境下已成为一部世界文学名著。

### 参考文献:

- [1]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 [2] 陈惠荣. 中文圣经翻译小史 (再版) [M]. 香港: 中文圣经新译会, 1987.
- [3] 陈忠. 圣经的全文汉译与它在中国的社会影响 [A]. 章开沅, 马敏.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 [C].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282-299.
- [4] 福斯特. 访问太平天国 [A]. 杜文凯. 清代西人见闻录 [C]. 张广学,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170-180.
- [5] 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86.
- [6] 顾长声.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 [7] 海恩波. 道在神州——圣经在中国的翻译与流传 [M]. 蔡锦图, 译. 香港: 国际圣经协会, 2000.
- [8] 李焯昌, 李天纲. 关于严复翻译的《马可福音》 [J]. 中华文史论丛 (64), 2000: 51-75.
- [9] 李荣芳. 哀歌 [A]. 李焯昌, 游斌. 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 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 [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10] 梁工. 圣经百科词典 [Z].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6. 699.
- [11] 林煌天. 中国翻译辞典 [Z].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 [12] 马礼逊夫人. 马礼逊回忆录 [Z]. 顾长声,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13] 马祖毅. 中国翻译史 (上卷)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 [14] 毛发生. 马礼逊与《圣经》汉译 [J]. 中国翻译, 2004, (4).
- [15] 任东升. 《圣经》汉译的文学化趋向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 (2).
- [16] 任东升. 论严复的《圣经》片断翻译 [A]. 2004 全国博士生论坛论文集 [C].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17] 圣经 (新译本) (第2版) 译本序言 [Z]. 香港: 天道书楼, 1999.
- [18] 谭树林. 论马礼逊《圣经》及其影响 [J]. 山东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0, (5).
- [19] 文庸. 圣经蠡测 [M].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2. 31.
- [20] 翁绍军. 汉语景教文典诠释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36.
- [21] 吴经熊. 圣咏译义初稿 [M].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6.
- [22] 尤思德. 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 [M]. 蔡锦图, 译. 香港: 国际圣经协会, 2002.
- [23] 张久宜. 圣经后典 [Z]. 北京: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 [24] 赵维本. 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 [M]. 香港: 中国神学研究院, 1993.
- [25] 周作人. 圣书与中国文学 [J]. 小说月报, 1921, (1).
- [26] 朱谦之. 中国景教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3. 118.
- [27] 朱维之. 基督教与文学 [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2.
- [28] 卓新平. 圣经鉴赏 [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
- [29] 邹振环.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6.
- [30] Hung, Eva & David Pollard. Chinese Tradition [A].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Z]. Ed. Mona Baker. London and New York. 1998. 369.
- [31] I-Jin Loh.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Bible [A]. *An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C]. Eds. Chan Sin-wai and David E. Pollard.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54-69.
- [32] Metzger, Bruce M. and Michael D. Coogan. *The Oxford Essential Guide to Ideas & Issues of the Bible (American Edition)* [Z]. New York: Berkley Books, 2002.
- [33] Strandenaes, Thor.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as Expressed in Five Selected Versions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Exemplified by Mt. 5: 1-12 and Col. 1* [M].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1987.

(责任编辑 张立飞)